

域外汉语教科书编选

中国古代小说 戏曲作品研究

(14世纪~20世纪初)

林彬晖 著



YUWAI HANYU
JIAOKESHU BIANXUAN
ZHONGGUO GUDAI XIAOSHUO
XIQU ZUOPIN YANJIU

湖南人民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08JC751013】
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湘社科办[2009]11号】

域外汉语教科书编选

中国古代小说 戏曲作品研究

(14世纪~20世纪初)

林彬晖 著



YUWAI HANYU
JIAOKESHU BIANXUAN
ZHONGGUO GUDAI XIAOSHUO
XIQU ZUOPIN YANJIU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域外汉语教科书编选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作品研究 /

林彬晖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 - 7 - 5438 - 6788 - 8

I. 域… II. 林… III. 汉语 - 语言教学 - 研究
- 世界 IV. H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2078 号

域外汉语教科书编选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作品研究

林彬晖 著

出 版 人: 李建国

责 任 编 辑: 周 熠

装 帧 设 计: 黄 敏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贝特利印务有限公司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 / 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90000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8 - 6788 - 8

定 价: 30.00 元

营销电话: 0731 - 82226732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绪 论	1
第 1 章 域外汉语学习的历史源流	4
1.1 古代东亚地区汉语学习源远流长	4
1.2 近代西方汉语学习的热潮	24
1.3 强大·衰退·复兴	26
第 2 章 朝鲜时代具有小说因子的伦理教材《五伦行实图》	30
2.1 《五伦行实图》的成书与颁行	31
2.2 《五伦行实图》各卷内容与中国典籍	33
2.3 《五伦行实图》与文言小说	42
2.4 《五伦行实图》编排方式与中国古代通俗书籍的刊刻风尚	51
第 3 章 朝鲜时代汉语口语教材与中国古代小说	56
3.1 《老乞大》、《朴通事》、《训世评话》的使用与颁行	56
3.2 《老乞大》、《朴通事》、《训世评话》与中国古代小说	60
附：《朴通事谚解》中《西游记》相关部分	63
3.3 元明小说表现手法在古代朝鲜汉语教材中的体现	75
第 4 章 日本江户时代唐话读本教材与话本小说	79
4.1 唐通事的产生和江户时代唐话教材	79
4.2 读本教材《闹里闹》、《养儿子》、《唐话纂要·和汉奇谈》	84
4.3 唐话读本教材的话本小说气质	92
4.4 唐话读本教材话本特征的中国来源和历史延续	95

第5章	日本江户时代用作汉语教材的笑书与中国古代笑话——	99
5.1	日本汉文笑书与汉语教材	100
5.2	日本汉文笑书风行的中国背景与中国古代笑话集的东传	105
5.3	日本汉文笑书对中国古代笑话作品的承袭与发展	109
第6章	日本明治时期时文教材的稗史化内容——	124
6.1	日本时文教材的发展	124
6.2	时文教材大同小异的内容编排与取材来源	127
6.3	时文教材部分内容稗史化的重要原因	131
6.4	时文教材中的稗史化内容	134
第7章	东亚汉语教材中的动物故事及其小说渊源——	140
7.1	朝鲜汉语教科书《训世评话》中的动物故事	140
7.2	日本明治时期汉语教材与寓言和童话	143
7.3	越南汉语伦理教科书《人中物》	148
第8章	西人所编汉语教材与中国古代小说——	154
8.1	禧在明与《中文学习指南》	154
8.2	戴遂良与汉语教材	168
第9章	作为汉语教材副读本的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和话本小说集——	175
9.1	通俗小说成为汉语学习的辅助教材	175
9.2	长篇小说在汉语教科书中的形态	180
9.3	充作教材使用的话本小说集	190
第10章	中国古代戏曲与朝鲜汉语教材——	194
10.1	《朴通事》中的戏曲唱词	195
10.2	《训世评话》中的戏曲故事	197
10.3	《伍伦全备》在朝鲜的刊行和使用	202
第11章	《西厢记》与汉语教材《语言自迩集·践约传》——	207
11.1	汉语教材中的“西厢故事”：《语言自迩集·践约传》	207
11.2	《践约传》对《西厢记》的改编	213
11.3	《践约传》的教材特点和文学遗憾	220
	附：1912年前《西厢记》的外译简况	225

汉语教科书是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域外传播的重要途径——227

一、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入选域外汉语教科书的标准 227

二、汉语教科书是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域外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 229

三、域外汉语教科书具有文献价值、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 230

主要参考文献——234

附录一：《中国语教本类集成》第1-5集、补集所收中国语教科书——240

附录二：《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所收书目——248

附录三：部分古代域外汉语教科书书影——249

——251

■ 绪 论 ■

语言（包括书面语和口语）的接触是文化交流的先导，人们对某种语言的态度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化魅力的反映，也侧面展示出这一国家、民族实力发展的状况。汉语在古代东亚地区举足轻重，这和中国封建王朝长期在亚洲居于强势地位密不可分。从现有的汉文献资料上看，历史上处于中国周边、属于汉字文化圈的那些国家和地区——朝鲜半岛、日本、琉球以及越南等，都曾长期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它们使用汉字、学习汉语、推行汉学。不仅以汉字书写的作品在古代东亚地区通行无碍，这些地区的民众还能够娴熟地驾驭汉字进行创作，为世界留下了众多的中国域外汉文学作品。从世界范围看，明清之际中华文化再度于西方掀起热潮，大量的传教士、外交官及其他西方人士来华，这一时期他们编写出版了相当数量的汉语课本、辞典等学习用书，部分人写下了汉文学作品，其中一些更成为知名的汉学家。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域外人士在学习汉文字、汉语言及汉文学、汉文化的过程中都离不开汉语教材，这些教材是值得人们关注的。

14 世纪以来域外汉语教材的内容涵盖甚广，其中不乏文学作品的身影。如朝鲜李朝初期，对于被明朝廷严令禁止的文言小说集《剪灯新话》，“上自儒生，下到胥吏，喜读此书，以为晓解文理之捷径。”^① 朝鲜官设译学机

^① [朝] 尹春年：《题注解〈剪灯新话〉后》。王汝梅，[韩] 朴在渊主编：《韩国藏中国稀见珍本小说》，卷二第 354 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构司译院也用戏曲《伍伦全备》当做汉语教科书。日本江户时代的唐通事家中，用来做教材的中国小说就有《今古奇观》、《三国志》、《水浒传》一类口语小说，而屡遭禁止的《肉蒲团》却成就了日本汉学家冈岛冠山。^①《好逑传》、《玉娇梨》、《平山冷燕》都曾是被威妥玛在《语言自述集》序言中推荐给西方学语者为提高汉语水平而阅读的作品。^②可见，汉语教科书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的不解之缘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早有学者注意到域外汉语教科书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之间的关系。如朱眉叔先生指出日本汉文小说《忠臣库》是“日本学习通俗汉语热潮小说界新变化的形势下，应运而生的高级通俗汉语教材和新型小说”。^③严绍璜先生在《日本寺庙藏汉籍珍本书追踪纪实》中曾说，冈岛冠山编撰的《续俗文音译》卷7“与人说故事”，其内容全部是从明代的《三言》中选取，有的则稍做改编。^④王三庆先生在《日本汉文小说丛刊·序》里也说：“参照我们收集的这批日本汉文小说，还可以看出文人创作时，常常抱着游戏笔墨的态度，就地取材大家所熟悉的内容，包括了日本民间笑话、传说与新闻等，以非第一专长的母语写作小说，用作教科书，作为增进学生学习汉文的兴趣。”^⑤关注到这一现象的还有潘建国、乔光辉等研究者。潘建国在《古代通俗小说目录学论略》中提到：“有意思的是，原本不登大雅且屡遭禁毁的中国通俗小说，一旦越出国境，却受到了很高的‘礼遇’，它们不仅是充满魅力的文学读物，也是学习汉语的绝佳教材，更是承载中央古国文化的重要典籍，在东南亚国家中拥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⑥乔光辉在《明初中朝文化交流与〈剪灯新话〉的韩国接受》一文中也表达了类似

① [日] 雨森芳洲《橘窗茶话》记冈岛冠山“只有《肉蒲团》一本，朝夕念诵，不倾刻歇。他一生唐话，从一本《肉蒲团》中来。”参见严绍璜著：《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第352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② 参见[英]威妥玛：《语言自述集》序言。[英]威妥玛著，张卫东译：《语言自述集》，第2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③ 朱眉叔：《从〈忠臣库〉谈到中国通俗小说对日本的影响》。《明清小说论丛》。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4。

④ 严绍璜：《日本寺庙藏汉籍珍本书追踪纪实》。《炎黄文化研究》。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

⑤ 王三庆：《日本汉文小说丛刊·序》。王三庆，庄雅州等主编：《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第1辑第1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2。

⑥ 潘建国：《古代通俗小说目录学论略》。《文学遗产》，2000年第6期。

的观点。^①

但是目前关于域外汉语教材的研究,或是来自教育史研究者,或是来自近年来渐成热点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者,虽然都提及了与文化相关的内容,但文学研究的视角并未渗入其中,未能更多地关注教材中的文学作品。而文学研究领域内,严绍璈先生、王晓平先生、李树果先生等在其研究成果中对这一现象都有提及,特别是严绍璈先生 2004 年在世界汉语教育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十七—十九世纪日本人汉语白话习学考略》,以他一贯坚持的“原典实证”方法,探讨了 17—19 世纪(江户时代)这样一个“长时段”日本人是如何接触、学习汉语白话的,对日本江户时代从事中国汉语口语翻译的专门人员即“唐通事”的研究尤其详尽,他们的身份、组织机构、人员名录、培养方法、所用教材、知识水平、具体翻译情况、同人结社以及他们对日本沿海各地乃至内地的影响等均得到论述。但是域外汉语教科书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之间的关系却一直未有专门深入的研究探讨。

本项研究正是想就这一点,探讨 14 世纪以来域外汉语教材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之间的关系。在此研究中所关注的汉语教科书,以教材文本所使用的文字为依据,以在实际中起到教授汉语作用为考量,故既有启蒙阶段的蒙学书,也有中、高级的史学、文学教材,包括了汉字教育、伦理道德教育、经学教育、史学教育、文学教育等各方面,在此基础上探讨域外汉语教材对于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的选择标准,传播文学作品、进而传播中国文化的情况。因汉语域外学习与传播的历史在东亚地区更为悠久,资料也更为丰富,所以论述中难免东亚部分涉及更多,西方编写使用的汉语教材受所获材料限制,相对薄弱,但为了更好地从整体上论述这一问题,不揣简陋,一并论之。汉语是目前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汉字、汉语、汉学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有特殊的意义,因此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小说、戏曲传思想于无形,传文学技巧于无形,传汉文化于无形,这在它作为域外汉语教科书时表现得最为充分,正是这个原因使我们今天的研究者不能对其忽视。

① 乔光辉:《明初中韩文化交流与〈剪灯新话〉的韩国接受》。《交流与互动:上海、汉城(首尔)都市比较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2006。

第 1 章

域外汉语学习的历史源流

1.1 古代东亚地区汉语学习源远流长

“东亚”这一概念，从地域的涵义上理解，是指亚洲东部的国家和地区。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涵盖的范围不尽相同。中国封建王朝自汉唐以来在亚洲的政治、经济、文化上占据着主导地位，其影响辐射于临近的国家和地区，并由此形成了相对一致、兼容并包、互相理解的文化传统，使“东亚”不仅仅是一个地域的概念，还是一个文化概念，即所谓的“东亚文化圈”。我们在此所说的“东亚”是指：封建社会时代以中国封建王朝为中心的华夏文明所覆盖的中心地带以及所辐射到的周边地区。它主要包括了中国封建王朝统治地区及其东邻国家，大体上包括当今的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此外还部分涉及同样受中国文化影响甚深的越南。

1.1.1 汉字·汉语·汉学

汉字是古代东亚地区的通用文字

汉字是一种表义文字，通行于古代东亚地区。“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交趾支那人和交州人使用的文字都相同，无论这些文字的发音相差多

么悬殊，这仍不妨这些民族阅读和非常清楚地理解‘用这种文字书写的书籍’”。^①

这种言文不一的现象在古代东亚各国十分普遍。言，即指以语音为表征的口头语言；文，在此指书面文字。东亚地区各族人民口头语言差异极大，除了汉民族产生了与自己民族语言相对应的汉文字外，其他各民族文字的形成都远远滞后。日本“假名”约形成于9世纪末、10世纪初的平安时代，越南的“字喃”约形成于13世纪，后于20世纪初改用拉丁化文字，15世纪时朝鲜李朝（1392-1910）时期才创制了“训民正音”作为本民族的文字。在朝鲜、日本、越南本民族文字产生之前，地处中国周边的这些政权都使用汉字颁布政令、记录历史，其官方教育和民间教育使用的书籍也由汉字书写。就是在本民族文字产生之后，汉字依然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因此日本学者西岛定生提出“东亚文化圈”四大共同文化要素，即汉字文化、儒教、律令制和佛教，^②排在首要位置的便是“汉字文化”。

汉字虽在古代东亚各国通行，但具体的使用情况各有不同。朝鲜半岛上先后建有高句丽（前37-668）、百济（前18-660）和新罗（前57-935）。《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载，高句丽第二代王琉璃明王时期，汉文字就已成为高句丽政权的通用文字。琉璃明王曾以汉文为其汉妃雉姬赋歌一首：“偏偏黄鸟，雌雄相依，念我之独，谁其与归。”而高句丽地区发现的大量用汉文字写成的碑刻、印章，以及瓦当、城砖等遗物上的铭文亦均用汉文字，这是高句丽政权通用汉文字的铁证。^③《日本书纪》应神天皇15年（284）8月条，16年（285）6月条，载有王仁博士从百济来献《论语》和《千字文》一事。公元346-375年，近肖古王在位期间，儒学家高兴博士以汉文撰修百济国史《书记》，可推知百济此前已使用汉字。《梁书》卷54列传第48“新罗”记载：“无文字，刻木为信，语言待百济而后通焉。”这是说新罗汉字的使用是透过百济而学得的。503年，新罗将国号、王号等均改为汉文名称，可见当时汉文字已确立为官方正式文字，545年，居柴夫

① [法] 安田朴著，耿昇译：《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第40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② [日] 西岛定生：《古代东アジア世界と日本》。转引自王金林：《“东亚文化圈”的历史回顾与展望》。周思源，林国立主编：《对外汉语教学与文化》，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

③ 马大正、李大龙、耿铁华、权赫秀著：《古代中国高句丽历史绪论·历史篇》，第16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域外汉语教科书编选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作品研究

006

等文士以汉文撰修新罗国史，进一步确立了汉字的正统地位。此后的高丽王朝（918—1392）亦使用汉字，穆宗王诵2年（998）铸乾元重宝，形制仿唐乾元重宝。币中“乾”字按古体，背有“东国”字样。嗣后所铸的“海东元宝”面文为仿宋真书。此外还有“三韩重宝”、“海东通宝”等，其钱币上所书均为汉字。朝鲜李朝世宗正统11年（1446）9月颁布“训民正音”文字前，其历代王朝所建儒学学校，一直使用汉字。“训民正音”创制后汉字依然被长期使用，到李朝末年，朝野通用的文字仍然是汉字。朝鲜北学派先驱洪大容在燕京期间（1765年12月—1766年2月）多次访问琉璃厂书店，不仅购得多种书籍，而且同清代著名学者严诚（1732—1767）、潘庭筠（1742—？）陆飞（1719—？）等能通过笔谈结交。^①直到1894年“甲午更张”^②废除了科举制度，才把朝鲜国文字作为共用文字。

越南地处中国南端，秦始皇时曾设南海、桂林、象郡，汉武帝时改设九郡，其中交趾、九真、日南3郡在今天越南的北部和中部地区。唐以后越南建立了独立的封建王朝吴朝，但一直以来，它的公私文牒悉依中国文体。越南第一个独立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李朝，规定汉字为全国通用文字。李公蕴建朝后于1010年颁布的迁都升龙（今河内）的诏书就是用汉字写成的。此后尽管政权屡有更迭，这些规定则无大改，形成“在十多个世纪中，越南用汉字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大部分对民族意识、国计民生、文学发展有影响的重要文学作品，都是用汉文写成的。……在我们的民族还没有自己的文字，或者说还没有自己的正式文字时，这些著作就是越南的，因为它们是由越南人创造出来的，是讲给越南民族听的，是为越南民族服务的。”^③

汉字传入日本，结束了日本列岛无文字的状况。9世纪初学者斋部广成

① 孟昭毅：《东方文学交流史》，第27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② 甲午战争后，在日本协助下，朝鲜新政府设立“军国机务处”，开始了内政改革，包括废除吏户礼兵工刑六曹，设立内务、外交、度支、军务、法务、农商务、学务、工务八部；废除八道，设立二十三府；官府分离，政府以总理大臣执掌，宫廷事务由宫内大臣执掌；废除科举考试；还有使用朝鲜王朝开国纪年、对腐败官员的纪律处置、放宽贸易活动限制、建立银本位的新货币制、在财政部管辖下统一财政管理、度量衡标准化、一切赋税用现金缴纳、建立股份公司、依据法院改组法把司法权分离、统一警察力量等社会、财政、文化等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共208条，史称“甲午更张”。

③ 文新，阮鸿峰等著《越南文学史初稿》。转引自孟昭毅著：《东方文学交流史》，第188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古语拾遗》(809年成书)中有:

盖闻上古之事,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忘。书契以来,不好谈古,浮花竞兴,还嗤旧老。遂使人历世而弥新,事遂代而变故,顾问故实,靡识根源。^①

可见汉字传入日本后对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9世纪末10世纪初假名文字形成后,汉字教育在日本并未由此消失。考察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的蒙学教育,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学校,儿童在学习了假名和数字之后还是要学习汉字的,直到19世纪末,黄遵宪向日本学者介绍《红楼梦》时都可以借助笔谈的方式获得理解。^②

琉球国,最初是指12世纪前后,在琉球群岛建立的山南、中山、山北3个国家的对外统称。后来推翻原中山王自立为王的巴志先后征服了山北和山南,于1429年形成统一的琉球王国,1430年明宣宗赐琉球王姓为尚氏,史称“第一尚氏王朝”。琉球国曾经向中国的明、清两代和日本的萨摩藩、江户幕府朝贡,汉字一直为琉球国的官方文字。如《历代宝案》一书,本是琉球国首里王府外交文件的汇编,共分为3大部,均以汉字书写。1879年3月30日,日本最终兼并琉球王朝,琉球亡国。

汉语是古代东亚的强势语言

汉语包括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书面语言即文言文,是汉字在语法规律的组合下构成的。汉字在古代东亚地区的通行意味着以汉字为载体的汉语书面语——文言文,在东亚范围内不受各国口语差异的影响而得到广泛认可。古代朝鲜、日本或越南对汉语书面语的称呼也相对一致,称为“汉文”。明治时代汉语教育者青柳笃恒在《支那时文轨范》第一章就明确指出:

日本所说的汉文和中国人所说的汉文在所涵盖的内容意义上是不同的。在日本所说的汉文与中国的古文(文言文)相当。^③

但汉语口语的情况就复杂多了。从使用的教材名称上看,在朝鲜有

① 转引自王晓平著:《亚洲汉文学史》,第2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② 笔谈存稿分别收在日本《大河内文书》和郑子瑜、实藤惠秀编校的《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日本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1968年5月出版)两书内。参见胡文彬著:《读遍红楼》第339页。书海出版社,2006。

③ [日]青柳笃恒编:《支那时文轨范》第1章。[日]六角恒广编:《中国语教本类集成》,第3集。不二出版社,1993。

域外汉语教科书编选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作品研究

008

《华音启蒙谚解》^①，有《学清》^②，即“学习清语”的意思。在日本，从古代到近代，不同时期分别有许多不同的称呼，如江户时代有《唐话纂要》、《汉语跬步》、《官话纂》等，冈岛冠山在《跋唐话纂要》中指出：“唐话者，华之俗语也。”明治时代有《华语跬步》（1886）、《支那语要略》（1887）、《清国语学习捷径》（1894）、《燕语启蒙》（1899）、《燕音集》（1900）等。而汉语教科书内容中也显示出对汉语口语的多种称法。

清音浊音半清半浊这等的字韵分得明白，后其间打起唐话来，凭你对什么人也讲通得了。……况且我教导你的是官话了，官话是通天下中华十三省都通的……

——《小孩儿》

看贵国的人，学我们的汉话，都像是费事得很，却是甚么难处呢？

——广部精《亚细亚言语集》卷之七《言语例略第一段》

汉语是古代东亚的强势语言，在此专指汉语口语。这种强势表现为对汉语口语的认同和努力学习。

朝鲜半岛历代王朝都注重与中国勤通使节，并选派人员到中国学习。《国子监志》载：“明自洪武初，即有高丽、琉球、中山、山南遣子入学，其后来者络绎。”但这种学习或许能做诗赋文，但不通口语亦无法在中国为官。故黄佐（1490-1566）《南雍志》曰：“外裔子弟，始自高丽遣金涛等四人入国学读书。洪武四年，涛登进士，除授县丞，不就，与三人皆遣归国。”^③金涛能够登科，说明他运用汉语书面语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他未留在明朝做官而匆匆回国则主要是汉语口语水平不高。对此，明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有明确记载：“是科，高丽贡士入仕者三人，惟金涛登第，授东昌府安丘县丞，寻以不通华言，请还本国，诏给道里费遣之。”^④明太祖对朝鲜李朝所呈的国书甚至译官的口语水平都曾有多次不满，并对朝鲜提出了严格要求。“你那里使臣再来时，汉儿话省的著他来，一发不省的不要来。”^⑤

① 该书由李应宪编纂，刊行于朝鲜高宗20年（1883），是朝鲜朝后期使用的汉语会话课本。

② 该书为《你呢贵姓》的另一种手抄本，《你呢贵姓》是成书于朝鲜高宗年间（1864—1906）的商务汉语会话课本。

③ 黄佐：《南雍志》卷15。济南：齐鲁书社，1997。

④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北京：中华书局，1993。

⑤ 吴晗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日本汉语口语的学习更多地受到商贸往来的影响。江户时期仅长崎一港对外开放,此处中国商船云集。根据有关材料统计,1622-1839年间,到达日本的中国商船达6200艘,仅1688年一年乘船至长崎的中国人就达9128人。因中国船只的到来而产生的大量中日之间有关贸易的翻译和实务工作均由唐通事承担,使得江户时代出现了许多唐话教材。而江户时代日本儒学者也推动了汉语口语学习。以荻生徂徕(1666-1728)为代表的“古文辞派”认为,用日本训读法学习儒家经典容易走样,必须直接用汉语的读音学习儒家经典,才能正确把握儒家的圣人之道。荻生徂徕和当时的一些汉学家经常在职任甲府老中的柳泽吉保家举行“讲书会”,用汉语讨论儒家经典。正德元年(1711)还发起成立了教授汉语的组织——“译社”,订立社规,坚持学习,并请当时汉语水平最高的学者冈岛冠山担任汉语教师。^①此外,佛教僧人的宗教交流也曾对日本汉语口语的学习起到促进作用。

东亚各国学习的汉语口语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并不一样。朝鲜半岛学习的是以元明以来北方语音为基础的口语,日本江户时代学习的中国口语——唐话,是以南京话为代表的,一般包括漳州话、福州话、南京话等,到明治时代才发生向北京官话的转移。但不论是南京官话还是北京官话,它们都是与汉语书面语对应的汉语口语。北京大学王顺洪先生曾指出:不管是白话还是文言,只要按照汉语的形音来传习,都应称之为“汉语学习”、“汉语教育”。^②学习汉语口语是东亚各国与大国交往的迫切需求,东亚各国对汉语口语学习的重视证明了它与书面语一样曾经在古代东亚占据着强势的地位。

汉学是古代东亚地区的通行学问

“汉学”,或称“中国学”,对其内涵与外延的认识至今都有分歧。我们一般地理解为外国研究中国文化的总称。凡是中国的文、史、哲、经、社、政等均为研究学习的对象,这是广义的汉学。狭义的汉学仅指儒学和汉文

^① 参见鲁宝元:《日本江户时代冈岛冠山编唐话教本在日本汉语学习史上的地位和特点》。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汉语教学信息中心编:《国际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2006年第1辑。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6。

^② 王顺洪:《日本中国语教育的道路》。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2006年五四科学讨论会论文。<http://hanyu.pku.edu.cn>

域外汉语教科书编选中国古代小说戏曲作品研究

010

学。古代东亚汉学的形成是中国文化不断地向四周作着强势散播的结果。儒家理念遂渐渐成为东亚各国共同的精神基础，中国文学的观念与意识也得到东亚地区普遍认可。故此我们只从儒学和汉文学两个角度考察其在古代东亚地区的通行状况。

朝鲜半岛上，高句丽小兽林王最早设立太学、传授儒学。《三国史记·高句丽·小兽林王本纪》载，小兽林王“二年（372）夏六月，秦王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王遣使回谢，以贡方物。立太学，教育子弟。”高句丽后期，地方小贵族和殷实人家的子弟，也积极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旧唐书》卷199上《列传》149上载：

俗爱书籍，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扁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曄《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春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爱重之。

百济在公元3世纪中叶以后就已建立了儒学教育制度，而儒学在新罗开始得到有力的传播则发生在6世纪以后。高丽王朝明宗（1170—1197在位）至元宗（1260—1274在位）时学校衰颓，文教沉滞，但高丽晚期的忠烈王颇重视经史教育，随着儒学推广，孔子在朝鲜半岛的声望日益提高。朝鲜李朝儒学大盛。世宗大王（1418—1450年在位）以精通儒学而著称，制订了五礼（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和士庶四礼：冠礼、婚礼、丧礼、祭礼，实现了以礼乐治天下的儒教精神。李朝中叶后，经过多次复杂的政治斗争，以郑梦周为代表的理学“道义派”发展起来，并诞生了儒学双璧：退溪李滉（1501—1570）和栗谷李珥（1536—1584），李朝理学由此达到了全盛时期。尽管随着社会发展儒教的形式和内容不断地有所改变，但儒教的基本理念，诸如“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大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经”，“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等，已经深深地根植于朝鲜半岛，成为民族精神的基石。

朝鲜半岛于5世纪前才正式形成了汉文学，但真正的汉文学的大发展是进入高丽王朝以后，而朝鲜“中世纪是汉文学的时代。可以说，中世纪文学一直持续到汉文学衰退为止。”^①李氏朝鲜建立之后虽创制了谚文并开始

^① [韩] 赵东一等著，周彪、刘钻扩译：《韩国文学论纲》，第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普及推广，但汉文学的创作与流传依然在广大知识分子中盛行。直到 17 世纪后，韩国国文文学才得到较大的发展，达到了与汉文学相抗衡的地步，但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汉文学在朝鲜文坛上是举足轻重的。

日本儒学一直从中国儒学中吸取滋养，奈良、平安时代的日本早期儒学，主要受到中国原始儒学和汉、唐经学的影响。进入镰仓时代（1192 - 1333）后，中国的朱子学开始传入日本。到了江户时代（1603 - 1867），朱子学在日本成为官学。随着中国阳明学和清代考证学传入日本，又相继形成日本的阳明学派、古学派、考证学派等儒学流派，形成了日本儒学的全盛期。有的日本学者说，日本儒学史“可以看做是带有相应变形而压缩地重复了”的中国儒学史。^① 顺治 9 年（1652），清世祖顺治向满洲八旗及中国各省颁布“六谕”，分为：一孝顺父母，二尊敬长上，三和睦乡里，四教训子孙，五各安生理，六毋作非伪。吉宗看到《六谕衍义》后，认为此书堪称德教方面的好书，对庶民教育甚为有效，便决定训点和译此书。^② 1722 年寺子屋所使用的教材中就有《六谕衍义大意》。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中国儒家思想在日本从上至下都得到重视。

日本摄取的中国文化之中，文学占了绝大部分，汉诗的风行便是代表。日本人在阅读和学习中国文学的基础上进而自己模仿着创作汉诗。7 世纪中叶，日本大友皇子、大津皇子是最初用汉文写诗的诗人。奈良时期汉诗写作蔚然成风。日本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约成书于 751 年）就是朝野上下文人推崇汉文、汉诗的产物。平安初期是汉诗文的全盛时代。《凌云集》（814）、《文华秀丽集》（818）和《经国集》（827），3 部诗文集共 24 卷，收录奈良朝以来 120 年间的代表性作品，绝大部分是平安初期诗人、作家的名篇。代表作家除嵯峨天皇、淳和天皇外，还有小野篁、僧空海等人。僧空海所著《文镜秘府论》，专论中国骈俪文学，不仅给日本汉学和汉诗以极大影响，而且也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保存了许多珍贵资料。平安末期，汉诗创作逐渐衰落，但 14 世纪禅学盛行时，禅家把汉诗文修养作为禅僧的必备条件，于是汉诗文复兴，以京都为中心形成了五山文学。江户后期，汉诗再次兴盛，一直延续到明治时代。

① [日] 永田广志著，姜晚成，尚永清，陈应年译：《日本哲学思想史》，第 61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② [日] 大庭修著，徐世虹译：《江户时代日中秘话》，第 93 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